

阅读亚里士多德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孙铁根

如果说柏拉图的对话篇能够让我们在愉悦的阅读体验中初窥哲学之门径的话,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体著作就像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我们很容易被其大量支离破碎的问题和繁难艰涩的分析搞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一部好的导论对于阅读亚里士多德来讲就是必不可少的。

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的《理解的欲求:亚里士多德哲学导论》(Aristotle: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称得上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导论。不同于坊间的同类型作品,它是一部黑格尔式的“哲学性的导论”。它既不试图提供面面俱到的介绍,也没有局限在当前学界所确定的问题视域之中。前者失之于表面而索然无味,后者极易沾染上现代的学术和价值偏见从而造成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行任意盲目的剪裁。本书致力于还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世界,从而揭示出哲学思考的真正品格和样态。

除了第一章总论之外,本书围绕着“所有人按照自然欲求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一核心命题,将宇宙论(第二、三两章)、灵魂论(第四章)、伦理学和政治学(第五章)、形而上学(第六章)融贯在一起,从而出色地展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宏观图景。全书精彩论述和创见颇多,像空间中有限与无限的概念革命,时间是精神秒表的比喻,主奴辩证法的思想史梳理以及科米蛙的可爱形象等内容一定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下面围绕人类理解与存在整体的贯通这一核心线索,简要分析一下本书中涉及宇宙论、灵魂论和实体论的几个重要观点。

作者在分析“四因说”的时候特别指出,“为什么”和“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合一的,因为寻求某个自然物之所以是这个自然物的原因就是在追问它的本质是什么。用来呈现“是什么”的本质并不局限在谓述命题结构的定义之中,因为逻辑各(logos)是客观存在的。同一个逻辑既体现在自然物的形式中,也体现在定义中。而且正是因为道出了形式或本质,定义才成其为定义。我们往往会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要么看成是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形式理论,要么看成是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那种使得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天形式。李尔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尽管可以包括上面的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元逻辑”的内涵;逻辑学表达的存在的秩序和我们认知的秩序的统一。谓述的命题结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这个世界自身所根本具有的可知性。

“四因说”并没有区分四种不同的原因,而是表达了原因的四种不同方式(fashions)。一个事物的自然或本性在于推动它趋向实现自身形式的发展动力。其中形式因、目的因、动力因和质料因(可归结为形式因和质料因二因)都只不过是用来描述和规定自然事物自身发展这一“事件”的不同方面而已。潜能与实现这一关系结构更能体现出这一点,事物的自然生长就是其内在形式从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四因或自然背后所蕴含的动态特征,而不能仅仅将其看成是静态结构。

对于有机体而言,灵魂和肉体通过从这一潜能到现实的运动过程就被统一和贯通起来。人类灵魂的本质就在于其所具有的理智(理解)能力上。整个自然世界的本质只有通过人类的这种理智能力才得以实现。青蛙的本质或形式得以实现是通过人类灵魂对这一本质的沉思,在此刻人类灵魂“变成了”青蛙的形式或本质;正是在对青蛙本质的沉思中,人类灵魂或本质也得到了实现。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自然或本性就是要超越自己的自然或本性。在自然世界的诸种存在者中,人类是唯一一种在自身之中就能得到最高形式实现的存在者,同时它也是其他存在者的形式得到最高实现的唯一“场所”。

理智灵魂是人类的本质或形式,我们是在人类这一物种的意义上讲的。李尔指出,这种种形式(species-form)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中确定的“首要实体(primary substance)”。成为实体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必须是彻底可知的,同时在存在论上又得是最基础的。实体不能是个别物也



《理解的欲求:亚里士多德哲学导论》, [美]乔纳森·李尔著,刘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75.00元

不能是普遍物。比如我们对苏格拉底尽管可以形成本质性的认识即“苏格拉底是人”,但他只是形式与质料的复合物,而我们不能彻底理解质料。因此作为苏格拉底的个别物就不是首要实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修正了《范畴篇》中将个别物视为实体的看法。)但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明确说“没有实体是普遍物”,像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就不是首要实体,因为似乎像“一”或“多”这类更高级的属概念尽管彻底可知,但并不是“这一个”。李尔指出,亚里士多德在个别物和普遍物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空隙,这就是“种-形式”,比如理性灵魂就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形式,在它之下是归属于人的个别成员,在它之上是比种更普遍的属(genus)。种-形式是最终的种差,是物种意义上的“这一个”。

种-形式满足了实体的大部分限定,但是还有一个似乎很难满足:实体必须是分离的,即存在论上是独立的。从属人的视角来看,形式只能被我们理智沉思的时候才是“可分离的”,而形式的这种实现却又依赖于我们的沉思。由于任何形式或本质都是在理智之中得以实现的,如果有独立存在的实体的话,它就必须是一个主动进行沉思的理智(思想自身思想自身)。它的思考活动和思考对象是绝对同一的,即它是完全和彻底得到实现的理智神。整个自然世界的可知性最终要归之为这个神圣的思考。

人类的思考与神圣的思考有类似之处。当我们主动进行沉思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变得与思想对象同一。但是人类思考的是在质料之中的本质,而神圣思考的是本质自身。只有在神圣思考中,形式或本质才得到了最高层次和程度的实现。人类思考必须要与自然世界发生关系,在实现自然世界的形式的同时自身的本质也得到了实现。同时,人类在对世界的理解中实现了对神圣思考的模仿。就整个自然世界在努力朝着神圣思考运动而言,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立场是“客观唯心论”。

哲学思考是人类生命中的神圣部分,人类在哲学活动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通过这种沉思,哲学家获得了形而上学的幸福。但是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活在自然中。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根本冲突:社会中的政治生活与反社会的沉思生活。沉思生活对人类的社政治生活毫无贡献,作为沉思者的哲学家没有对其所生活的城邦担负过任何社会责任,但他们必须得需要社会提供给他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似乎是最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从属人的角度来,哲学生活的确是非伦理的。但是哲学沉思是完全普遍和非人格的:“虽然沉思的人将他的社会责任抛在了身后,这个选择并非自私,因为沉思的人也同时抛开了任何可以自私的自我。”这是我们对的哲学生活方式最好的辩护。而这才是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时刻”。

本书试图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而还原出真正的哲学思考(philosophizing),并让我们有可能在“回到事情本身”的过程中而进入到活生生的哲思之中。亚里士多德这种活生生的存在之思启发了像黑格尔、海德格尔甚至德勒兹这样的后世哲学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风暴。

有人说,死去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比他们知道得多得多。的确是这样,因为他们正是我们所知道的(艾略特语)。相信这本优秀的导论肯定能够让我们更加理解亚里士多德,而理解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也就等于理解我们自己。

《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一座史料宝库

■周育民

八厚册《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在编者秦宝琦先生八十五寿诞之际,终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秦宝琦先生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涉足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他是从尘封在故官里的浩瀚档案中起步的。其中有关天地会的档案分散零落,在1960年代除了蔡少卿先生在其中搜寻到一部分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档案之后,很少有人再动过。经过秦先生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1980—1988年间陆续出版了他编纂的“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共七册,有关清代前期天地会的档案史料终于基本上面世,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我在八十年代刚踏进历史学领域,甚沐此书甘露。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秦先生的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成果迭出,成为国际著名的中国秘密社会史专家。除了大量论文之外,他出版的专著有《清代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洪门史)《中国地下社会》(三册)《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等等,参与主编了七卷本《中国秘密社会史》,与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H. Murray)合著了《天地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还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会党篇》的主撰专家。在研究和著述过程中,秦先生仍坚持不懈地从国外和国内广泛搜集有关清代天地会的史料,因此,《集成》可以说是凝聚了秦宝琦先生半个世纪心血而结成的“正果”。

《集成》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乾隆中期天地会起事的史料。第二部分是乾隆后期林爽文起义的史料。第三部分为乾隆末年天地会起事和重大案件的史料。第四部分为嘉道年间(1840年以前)各地天地会活动的史料。第五部分为天地会各种会簿和腰凭的图录。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七册坊间已难寻觅,《集成》在原有基础上,不仅订正了一些错别字、漏字和衍字,而且增补了作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新史料,增补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乾隆朝朱批奏折》中的相关内容和散藏在军机处月折包中的林爽文、庄大田等人的供词和奏折,增补了《清实录》中的有关资料,并且对相关奏折、谕旨按照奉批和具奏的时间顺序重新排列,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了清廷镇压天地会起事和处理有关案件的过程。尤其珍贵的是,《集成》不仅完整还原了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此次使用了英国大英博物馆天地会《会簿》的影印件)和罗尔纲《天地会文

献录》一些天地会文件的原本,而且增补了加拿大洪门洪顺堂收藏的《锦囊传》全本以及广西发现的杨氏会簿抄本。这样,迄今已知的清代天地会会簿,大部分都被收入了《集成》。此外,秦宝琦先生还从档案、图书中辑入了一些清代国内和海外天地会的腰凭(会员凭证)图案。当然,会簿的整理还存在着一些遗憾。例如,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天地会会簿第一号复印件,未照原件上有中文记账数码标记的页码编排;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天地会》(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f Heaven-Earth-League, Patavia, Lange & Co. 1866)所利用的天地会簿一部分似可收入。

《集成》无疑是清代天地会研究的最重要、最完整的一本史料集,嘉惠学术,功德无量。就前四部分而言,有关清代前期天地会的官方文件几乎备载无遗。这些镇压天地会起事和办理相关案件所形成的档案文书记载了天地会的许多活动,有些明显,有些隐晦,其中有些脉络线索,甚至当台的办案人员也没有弄清楚。我曾经利用其中的一些奏折,发现了天地会与青莲教在江西、湖南等地大量融合的现象。可以肯定,在这些奏折、谕旨和天地会会簿中还有其他许多清代江湖的隐秘信息,有待发掘,尤



《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秦宝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第一版,5980.00元

其是会簿中的大量信息,学界迄今未能有系统的研究和解释。清代惩治会党律条的具体运用,《集成》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仅奏折的具奏日期与奉批日期,就提供了清代邮驿和军报和刑案公文处理时间的丰富统计依据,更无论其中涉及的不少官场人事和军队调动。所以,《集成》的史料价值并不局限于江湖。做社史史研究的,还可以从中发现大量的社会史信息。总之,这是一座值得进一步开发的史料宝库。秦宝琦先生倾其大半生心血,已经打开了天地会史料的宝藏之门,其中堆满了一块块璞玉,正期待后学的慧眼神工。

新见迭出的《史记》地名族名研究

■宋健

是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研究又以断代为主,诸家说法不一,很难直接整理出结论。所以,作者对先秦、秦汉政区进行了梳理,既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也有自己的考证,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例如本书第249页,首次指出汉初有“淮阴郡”,并梳理了其沿革。经查《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荆王刘贾“为英布所杀,国除而为郡”,而此时才有侯刘襄“为淮阴守”,这便解释了荆国国为何郡的问题。本书还在多处指出了《史记》点校本的断句错误,例如第322页指出,“蔡”与“阳”是魏国的两个地名,而非“蔡阳”;第35页指出,“丹犁”是西南地区的一个部族名,而非“丹”与“犁”。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本书梳理郡级政区沿革,提出秦郡与西楚政区的新说。秦郡问题一直是秦汉政区研究的热点。书中有关先秦政区的观点,分散在各个词条中,依次整理书中的词条,可以知其对秦郡的认识如下。始皇二十六年,秦统合六国时有三十六郡: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会稽、颍川、碭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广阳、河内、衡山、洞庭、苍梧。这种说法与学界之前代属秦政区与郡族等,他在撰写本词典时也十分注重行政区划。每道郡、县等行政区划词条,他都记述其建置沿革。其实这项工作的难度不小。《史记》中涉及的政区,上自春秋战国,中有秦楚,下至西汉,年代跨度比较大,涉及的朝代、国家很多,但

建》一书认为,强国会寻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但随之诞生的秩序的前景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承诺并约束自身权力。为此,他对1815年、1918年、1945年这三个时间节点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进行了回顾与梳理,以此来探究全球秩序的组织形式、世界政治中的制度作用,以及历史上战后安排的教训。从历史来看,新国际秩序的建立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也不能想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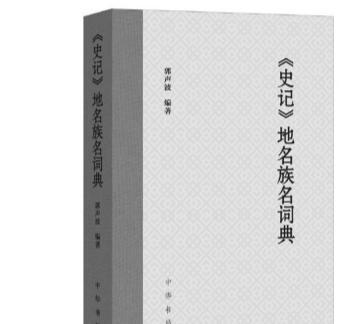
国际秩序是有新旧之分的。在国际旧秩序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少数大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就本质而言,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基本特征。很显然,包括1945年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在内国际秩序,都属于国际旧秩序的范畴,不公平性显而易见。而较为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必须

海、豫章和吴郡,另将四川郡改为都城所在的直辖区,相当于秦内史。以往学者都执着于“九”这个数目,本书另辟蹊径,提出九郡之外,还有一直辖地,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将县级政区分归郡下,补充秦县,区分县和邑。《战国政区地理》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都列出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属县,但没有将这些县归入具体的郡下。《词典》在这些古县的词条下,都将它们归入春秋战国时某国某郡之下,做了更细致的政区沿革梳理。本书还通过汉县追溯秦县,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本书第86页“安国”词条认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析河南郡地置安国县,割夷河间郡。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认为秦代安国县属恒山郡。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代卷》无安国县。可见,本书对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采纳,而是另有创见。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并不鲜见,都是作者在贯通梳理政区沿革时发现的。

此外,本书对秦汉时期“邑”这种特殊的县级政区做了区分。如书中第410页丽邑条,认为秦代丽邑为“县级行政区”。本书对县与邑的区分,主要以名称为依据,名字中带有“邑”字,则认为可能属于“邑”,改写为“县级行政区”而不是“县”。不过对秦汉时期县与邑的区别,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县名中不带“邑”字的政区也有可能属于邑,名中有“邑”的地名可能只是“邑”字被保留了下来,与地名融为一体,本身不一定属于邑。

关于西楚政区,本书亦有新解。《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王九郡,都彭越。”历来学者对“九郡”所指争论不休。本书提出,西楚所辖九郡为南阳、薛郡、会稽、东郡、碭郡、淮阳、东



《《史记》地名族名词典》,郭声波编著,中华书局2020年5月第一版,82.00元

遗憾之处。同一个地名,在《史记》中出现过的含义纳入书中,未出现过的含义则不涉及。比如第167页南昌条,《史记》记载了东海郡的南昌亭而未记载豫章郡的南昌县,故《词典》只取前者。在汉代以前存在过的一些地名,因为没有出现在《史记》正文中而造成缺失,虽然这不是本书的问题,但我们也需认识到,《史记》地名、族名词典》不等同于《先秦、秦汉地名、族名词典》。

本书对地名进行了分类,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办法,不过具体细节可能还有完善的空间。其中“山文类”中,“山地名(含山区)”其实所包含的都是山区,或可直接称“山区名”,同理,“山岭名(含山脉)”也可直接称“山脉名”。此外还有一些复合型命名,如“丘原名”、丘和原的含义差别较大,放在一起是否合适?

本书一些结论在学术界可能仍存在争议,或属于新说,譬如上文所谈的关于秦郡和西楚政区的解释。作为工具书,不确定之处不宜太多,但对于肯定,它所揭示的秦汉县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希望作者可将考证过程另外整理出来,以供学界讨论。

国际秩序:历史与未来

■星空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句话也适用。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规则之上。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等。现代意义上国际秩序的探索,始于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之后,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建立了由俄、奥、普、英四国支配欧洲的维也纳体系。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了雅尔塔体系。从冷战结束至今,新的国际秩序仍在形成之中。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普林斯顿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主任G·约翰·伊肯伯里《胜利之后: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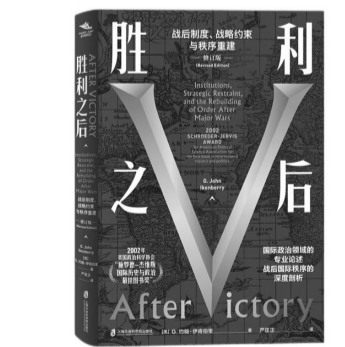
建》一书认为,强国会寻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但随之诞生的秩序的前景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承诺并约束自身权力。为此,他对1815年、1918年、1945年这三个时间节点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进行了回顾与梳理,以此来探究全球秩序的组织形式、世界政治中的制度作用,以及历史上战后安排的教训。从历史来看,新国际秩序的建立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也不能想当然。

国际秩序是有新旧之分的。在国际旧秩序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少数大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就本质而言,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基本特征。很显然,包括1945年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在内国际秩序,都属于国际旧秩序的范畴,不公平性显而易见。而较为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必须

经过长期的、复杂的艰苦斗争,才能最后建立。

在这本书里,G·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基于对1815年之后的维也纳体系、1918年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利弊的反思,1945年之后的雅尔塔体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并且有效发挥了作用。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建立宪政秩序的根本动机在于将其巨大实力转化为合法地位,且不得以制度安排约束其权力来使得弱国愿意接受这个体系。而弱国也可以利用制度与领导国讨价还价,避免被主导或被抛弃的危险。但雅尔塔体系的稳固也只是相对而言,对其的动摇与瓦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就开始了。

冷战结束至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调整已经经历了一个过程。“9·11”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



《胜利之后: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修订版), [美] G·约翰·伊肯伯里著,严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5月第一版,75.00元

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到底会在何种程度上再次深刻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是一个未知数。构建国际新秩序,是一个动态博弈和演变的过程,但也需要理论探讨。无疑,《胜利之后: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一书有助于推动这样的理论探讨,也可以帮助公众从更专业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国际政治问题。